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赵同良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中华文化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积厚流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一以贯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国古代长期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母体,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丰厚滋养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根基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20)05-0103-10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

一、世界上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大地境内曾经存在过许多其他氏族、部族、部落,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地域性、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但是,在华夏文化的主导作用下,多个氏族、部族、部落、民族的文化不断交

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终在华夏文化的熔炉中熔铸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外来文化也曾大量传入中国,但中华文化并没有被改变、被异化,整体上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稳定结构和民族特色,并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发展的旺盛活力。这种独特的文化特质,使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文化发展从未中断,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国文明。

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为什么唯有中华文明一次次战胜灾难,渡过难关,历经五千多年而绵延不断,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罕见奇迹,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形成了为整个民族共同体共同认可、普遍接受、一脉相

收稿日期:2020-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招标课题“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研究”(18VJSJ08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17JJD710001);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领军人才支持专项(W04)“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创新性发展研究”(2017THZWLJ01)。

作者简介:赵同良,男,河北安新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承且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的思想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是中华文化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常用二分法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而文化实际上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体系,是物质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而组成的一个大系统。因此,它表现于多个领域,表现为多种形态,比如表现为认识类的事物(哲学、思想、理论、观念、语言、科学、教育等)、规范类事物(信仰、信念、理念、道德、法律、习俗等)、艺术类事物(文学、艺术、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等)、工具类事物(人们所使用的各类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如衣食住行用具等)、社会组织类事物(经济组织、政治机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乡规民约等)等方面。这些方面的文化因素相互影响、紧密联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体系,既绚丽多彩,又协调统一,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发展稳定,一脉相承,有着自身的特色。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传播。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又最富稳定性的语言之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字大约起源于公元前6000年(属于新石器早期,由出土器物上的符号推断)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夏商之际,小屯殷墟甲骨文成熟文字之前)。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是殷墟甲骨文,此后经西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以后形成楷书,延传至今。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古老文字或遗失或发展成表音文字,中国汉字几千年历史发展中从未间断,使用至今。虽然也有由线条到笔画的转变,原始图形性已淡化,但表意性仍然是其最突出的特点,是

世界上最古老、最具系统性的表意文字。汉语汉字是中华文化其他项目的重要载体,在一定意义上,汉语汉字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密码,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促成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又传播着中国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形式,它经历几千年的发展而从未中断,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突出、最具活力的典型代表,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美学精神和文化传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9]中华民族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底气,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注重“文以载道”,通过诗文表达特定的价值观和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历史散文的共同准则,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古代的器物制造,以更直观、更形象的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绚烂多彩。可以说中国器物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瑰丽奇巧、浑厚博大的中华文化发展史,每一件艺术珍品都是一段历史,每一件艺术瑰宝都闪烁着中华文明的火花,映衬着古代时期的社会环境、政治思想和审美内涵,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远古时期精美的陶器到雄奇庄重和谐的青铜器,从精美绝伦、寓意深刻的玉器到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的中华瓷器,每一器物无不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创造智慧,呈现着中华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两周儒雅俊逸之风,汉唐雄浑壮美之势,两宋精丽柔婉神韵,明清绮丽伟岸气质,均通过这些器物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

工艺之高超领先世界的唐代的唐三彩以及发端于宋、鼎盛于明清的紫砂陶瓷展现着中华陶艺的举世无双,独步全球,不仅是当时陶器制作的巅峰之作,更是留给世人的艺术宝藏。不仅器物如此,其他类以物质形态延存的艺术形式,如建筑、雕塑、园林、书法、绘画等,无不浸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深的意蕴,有的表达着中国古老的和谐统一思想,有的展示着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将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理想、人文情怀生动地展示出来。概其大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终境界是“和”,这正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反映。

二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积厚流光。重伦理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虽然任何民族及其文化都有重视道德、宣扬道德的传统,但恐怕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极度重视道德,把道德放在文化系统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以血缘家族宗法关系为核心建立起来,在本质上是一种血缘、人伦、宗法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主要是建立在人的伦理关系基础之上,主要以人们的情感信念为纽带来实现。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伦理具有肩负实现有序秩序和调节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家国同构”的家庭—家族—社会—国家政治的社会结构,使得家庭伦理关系、家族宗法关系扩展、上升为规范社会关系、国家政治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家长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血缘、人伦、家庭、家族、宗族的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它既是一种伦理政治,又是一种政治伦理。其他文化形态无不是以宗法为中心、以伦理为中心,从而在哲学观中并未形成西方那种客观理性的自然观,而是认为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天”也是具有人格化的伦理色

彩;文学艺术讲究“文以载道”,其“道”就是对“至善”的追求;对人的定义也是认为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在对人的塑造、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上,形成了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建构了一套完善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这套体系无论是从内在的情感信念上,还是从外在行为的要求上,都发展出一整套很完备的德目,从而使中华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又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比如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礼、孝、悌、忠、恕、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德目。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积淀出来的传统美德,成为传统价值体系和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本内核,如“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谦和好礼”使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知名世界;“诚信友善”把“诚”看成是“天道”的根本、把“信”看成做人的根本;“知恩图报”讲究付出与奉献,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重义轻利”讲究追求公正与正义,把追求享受和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等等。

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一以贯之。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彰显民族特色的载体。自古以来,在中国这片广袤开阔的地域上生活着不同的民族群体,近百年来统称为“中华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首先来自于对共同生活的地域认同——我们都“居天下之中”——对“中国”的认同。“中国”原义为“中央之城”,指京师国都位于国境中央,后逐步引申为诸夏列邦(即中原一带)、中央之国等,多与“四夷”相对,指“四夷”围绕的中原地带。古人持“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自己所在之地为“天下之中”。这个“中国”的概念,其地域是不断扩大的,西周时主要包括宋、卫、晋、齐等

中原诸侯国,战国时期“七国”都被纳入“中国”的范围。

“中国”原指华夏族活动的地理区域并兼具政治中心的涵义,后又派生出文化中心的涵义。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公子成驳斥反对。据记载:“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赵世家》)一句话,“中国者,礼仪之邦也”,此后便成为人们使用“中国”这一概念的“指称”。宋以后,“中国”的含义慢慢有了“国家”的意义,元代已自称本朝为“中国”,但在明清时期还主要是在“华夷之辨”的意义上使用中国。鸦片战争后,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交往中,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逐步取代了“居四夷之中”的含义。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以“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对“华夏”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还来自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是“中国”与“华夏”复合词的简称,中国先人自认为居于“天下”的中心、中央,且文化发达,因此自称“中华”。“华”通“花”,意指文化灿烂、繁荣、发达,文化的含义原是“中华”一词的主要内涵。“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唐律疏议》卷三)步入近代后,“中华民族”渐渐成为生活在中国的多民族之总称,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孙中山曾对“民族主义”作过深入阐释,认为“中华民族”乃是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4]。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近代概念,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汉族与其他民族长期交流、不断融合。经过长期的民族迁

徙和融合,形成了汉族占多数,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这种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使中华民族在繁衍、发展中不断交融,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生生不息,既有色彩缤纷的多样性,又有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的一致性。正是这种来自长久历史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使华夏民族发展至今,文化延绵不绝。

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并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独特的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连绵不绝、一以贯之,首先是与我国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关系。我国不仅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较好,位于亚欧大陆板块的东部,东临太平洋,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地势西高东低,丘陵平原多分布在东部,环境适宜,西部有着大型高山、高原、盆地,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理条件严酷复杂。我国大部分国土处于北温带,季风气候明显,大陆性气候强,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大部分地区温度和降水配合良好,为农业的开垦提供了适宜的条件。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耕作和生活,因此先民最终在这里生活繁衍、发展农业,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农业在我国不仅发展早,而且丰富完备,从根本上决定并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内容和特点。我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华文明在实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它的内容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中华文明的传播也主要是随着农业的扩大而不断向四方扩展的。

长期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我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影响四邻,地理环

境和地理位置同样是重要原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文明发展程度最高。我国周边的近邻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的文明程度,总体上落后于我国古代文明,因此在文化交流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未受其冲击和挑战,反而作为强势文化向周边地区不断辐射和传播,形成了区域型更大的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从未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和产生重大危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稳定地发展着,历经数千年源源不断。即使我国古代曾多次与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军事冲突、战争不断,甚至蒙、满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但因为在文化上落后于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交汇交融中被同化。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至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人类交通不发达的时期,也正是因为高山、高原、沙漠、海洋等地理因素的阻碍,使得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困难重重。因为经济政治条件制约及自身文化上的原因,中华文化整体上有其保守的一面,也缺乏积极主动向外输出的动力,中外交流规模不大,外来文明传入困难,更不用说对本土文化造成较大影响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

其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中国古代长期稳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稳定和延续的经济基础。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朝代更迭不断,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成为新的统治者,但是中华文明从未因战火而中断,未因朝代更替、“国家”灭亡而覆灭,究其经济上的原因,农耕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根本所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生不仅早,而且成熟完备,这既是中华文明得以兴盛的优势所在,也是后来成为制约其他经济新因素发

展的阻碍。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王朝统治的根基,因此统治者极度重视农业发展,严格限制人口流动,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原地从事农业生产,重农抑商,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使这种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缓慢,难有新的突破。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对于保障农耕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为其服务的官僚体系,并不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政府决策抑制了商品经济新元素的产生和发展,从而使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在本质上一直变化不大,为其服务的文化也越来越保守固化,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因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缺乏灵活的自我更新能力,使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一种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稳定与战乱”的周期性循环,王朝更替,周而复始。这种周期性的破坏和循环,也使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文化在“周而复始”的“破坏—重建”中难以不断健康发展成长,更难以有实质性的新突破和实质性创新。新王朝建立,政策相对宽松,休养生息,社会相对比较安定,经济复苏,人口增长,日久生弊,政治腐败加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减少,改朝换代,百废待兴,进入下一个循环。这种周期性破坏和循环,严重遏制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难有突破性发展,改变不大,因此持久地保持着“原貌”。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与自身特点密切相关。文化即人化。人并非像动物那样,依靠先天的生物性本能生存,而是靠后天习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知识技能生活,而这些都是通过文化熏陶、文化传承和风俗习惯来完成的。人的这种被规定性,使得人可以有多种发展可能。文化对人的这种塑造是一个人从生物人

到社会人的重要社会化过程,但把人塑造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目标。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区别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和教化方式。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农耕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有着鲜明的特征。其他地区文明固然也有农业生产,有农业文化,但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得更完备、成熟,更早。正因为农耕文明成型过早,以至于压抑了其他文明类型如商业文明、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等的发育。比如,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并未能像西方那样发展形成一个发达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由于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也并未发展形成一个发达的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而是始终停留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农耕文明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追求稳定,因为生活的一切几乎都与土地密切相关,需要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生活,需要安居一定、少有迁徙,人与土地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定居、安居意识特别强烈。离开家乡被视为非常不幸的遭遇,眷恋家乡的“落叶归根”意识浓厚。费孝通把古代中国称为“乡土中国”正源于此。中国特有的“籍贯”概念反映着这种特点,对于经常迁徙的民族来说只有出生地的概念,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籍贯”就是出生地,因为常住在一个地方,因此“籍贯”的概念才有意义。

对于常年住在一地的中国人来说,“家”是生长得最长久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联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中国文化首先是一种血缘文化。农耕文明,地缘即血缘,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建立首先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血缘关系秩序成为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即以血缘关系作为准则去衡量、处理、认识各种社会关系。所谓“家国同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皇

帝和臣子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把地方长官看成是“父母官”,把师生关系看成父子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等;把“天”人格化,称为“老天爷”,祈求神明“土地爷”保佑土地丰产,祈求神明“财神爷”保佑生产经营发财,等等。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熟人”文化,其根源也在于对于长住一地的街坊四邻也是以血缘关系与其交往,“熟人”间即使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也是以血缘的“哥哥”“嫂嫂”“叔叔”“婶婶”等相称,形成“一家人”似的关系。即使跟陌生人打交道,也要把“陌生人”拉上关系,变成“熟人”后才好交往,见年纪大的称“老哥”“大哥”“大姐”,见年纪老的称“老伯”“大妈”“阿姨”等。因此,中国文化又是一种亲情文化,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亲”即“近”,血缘关系越近,感情越深。

在中国古代“亲情文化”的塑造下形成了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体现在人际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亲情文化”里,“情”是最重要的,而“理”则次之,“法”再次之,所以中国古代排序是“情理法”。居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甚至把这种“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言之,“仁”的本义就是以血缘秩序为本,亲疏有别。进行教育,以“文”化“人”,就是用后天的培养使人要“成仁”,这就要学“礼”。“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其实质就是要学习各种规章礼节,使自己知道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不要违背“亲疏有别”的等级差序。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的治国理政方式和管理方式既不是一种法制社会与国家的治理方式,也非一种通常人们认定的“人治”社会与国家的治理方式,而是一种“礼法”社会的治理模式,故号称“礼仪之邦”。在中国,所谓“做人难”,无非是不能很好地处理“亲疏有别”的各种人际关系,“亲”的疏了不行,“疏”的亲了不行,亲疏要拿捏得度,否则

就失了“礼数”。学礼,就是学习恰当地做人,学会以恰当的方式待人接物。对于个人来说,首先要自己学会礼让,这就要求人有“德性”,要注重修德。因此,中国文化也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德行文化。

由以上中国文化的种种鲜明特点可以看出,这种“血缘文化”“乡土文化”“亲情文化”“德行文化”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凝聚力和亲和力,从而也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承力、辐射力。“亲情”关系可以不断外推,从“家”扩大到宗、族、村、县、省、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文化心理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凝结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延传至今。

三、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根基

一般而言,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传统文化常被视为一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消极力量。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5],“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6]。恩格斯虽然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揭示“传统”的消极作用和影响的,但也给我们一种启示,“传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惯性力量。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传统”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想谋求剧烈变革期望改变它,还是想借助它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传统”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必须要对“传统文化”具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要站稳脚跟,就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作用。习近平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7]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母体。关于“人”是什么,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有道德的动

物,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会劳动、能实践,人使用语言和符号,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用一种“大文化观”去关照人的本质,可以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特定存在。因此,从本体论看,文化就是人之为人、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铸就了一个民族特定的存在方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表现着这个民族的特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是“百姓日用之而不知”的集体意识和民族心理,如同遗传基因决定和塑造着生物有机体的种属和特征一样,传统的“文化基因”也决定和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类型和特色。“文化”就如同人的内在生命。人厌恶自己的缺点,讨厌生病,但纵使自己有很多毛病又有谁轻弃生命呢?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就是这个民族生命本身。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传统、没有了传统文化,也就没有了民族本身。中华民族自古就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以“礼仪之邦”“信而好古”“文明古国”自居,一直将道德视为“安身立命”“安邦兴国”的根本,一直将中国传统文化视如生命一般宝贵。须知轻蔑传统就是轻视自己,抛弃传统就是放弃自我。习近平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8]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正如自信是人立足之根本,文化自信也是民族立足世界之林之根基。习近平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沉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妄自菲薄,否定自己的历史,鄙夷自己的文化,抛弃自己的传统,无异于否定自己、轻视自己、放弃自己,这样的人必定是自卑的、软弱的、无助的,这样的民族注定是可悲的、无力的、渺小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0]。中华文化绵延发展几千年,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我们的先辈曾创造出令世界叹服的多彩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的宝贵资源。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已渗透在我们的血液血脉中,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事物的深层“背景”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巨大的无意识沉淀,作为中华民族既得的思维传统,以一种潜在的形式无形中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既有思维框架来进行信息选择、加工和理解的。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否定自己的灵魂,无疑是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这个民族。釜底抽薪,毁掉根基,何谈民族自信自立?另一方面,尊重过去,继承传统,与吸纳、借用外来有益文化因素,与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新并非就是相悖冲突。创新永远是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然而,创新也要以传统为基础。一种传统破易立难,当一种传统被有意无意抛弃之后,一种新的传统可能需要几代人继续努力才能形成。传统并非是“死”的,只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先代遗物,反而它是“活”的,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已有文化遗产,进行二次创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创新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生搬硬套,照抄照搬外来虽然成功过的文化,还可能造成“消化不良”,引起新的“梗阻”“病症”。总之,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立足时代、成就未来的深厚基础。在几千年接续奋斗中,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11]。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华文

化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和影响,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汲取文化养分的重要源泉和重要资源。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2]他还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13]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代在不断变化,发展从未停顿,但创新不能是空中楼阁,发展不能没有基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如中国古代社会“士”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在今天依然有其合理价值。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国家选拔人才,科举考试主要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和修身思想。这种“士文化”彰显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今天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党政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提升思想境界可资凭借的优质资源。中国古代文人常怀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坚持正道自然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士人更应该坚定信念,坚韧不拔,不畏艰苦,勇于弘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的“从

道”“弘道”思想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思想家、仁人志士都以“从道”“弘道”为己任。孟子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道”的内容,在封建社会时期有其时代的局限,但这种无所畏惧的“从道”“弘道”精神,却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的一个重要动因。近代以来,在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之际,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解危济困,安邦救国,敢于突破旧制,勇于改革创新,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从道”“弘道”精神的真实写照。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成为社会发展的脊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畏气概,至今都应当是现代知识分子和文人志士的精神鞭策。

参考文献:

- [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9.
- [2][7][8][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3—164,164,164.
- [3][9][10][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50,349,349,339.
- [4]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8.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2.
-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19.

[责任编辑 杨捷]

Deep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ZHAO Tonglia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ter a new era.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deep found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ntent of Chinese culture is rich and self-contained.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ccumulated a long history.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onsist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that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long-term stabl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long-standing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mother of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elf-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lso is the rich nourish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stand firm in the agitation of world culture.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nfidenc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eep foundation